

“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第二辑）

主持人语：本刊在 2012 年第 5 期上发表了第一辑“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稿，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充分显示了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高度关注。眼下，中国正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无论是政治经济之健康发展，还是社会文化之保育革新，都需要学术界提供更多历史经验的借鉴。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已经意识到中国当代史研究在资政济世方面的重大价值。从学术承继与创新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史之研究，最近更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关注。然而，有价值之研究成果的产生，仍需要研究者倾其全力而为之，并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为此，本刊继续邀请学者就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此次参加笔谈者，除上海本地学者外，还包括在上海以外高校工作并长期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者，相信他们的见解不但有助于本次讨论的深化，亦能引起读者更多的思考。

史学重心的第二次下移：对当代史研究的期望*

王家范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6-0151-03

作者简介：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 200241）

收稿日期：2013-01-04

* 蒙冯筱才、金大陆二君邀请，一定要我参加这个笔谈。其他发言者均行家里手，我乃一“行外人”，然屡辞未果。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开会，我有即兴发言，他们将录音整理发来请作修改，无奈中只好草成此篇，亦借此打破“观棋不语真君子”之旧规也。

历史是一代人继一代人的时间接力长跑，所以人们常喜欢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时会感慨每一代人总是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前行。许多问题前人没有或者来不及解决好，交给下一代人“接力”，这是自然之道，埋怨是没有道理的。积极的态度是打开包袱，细心清理，会发现不尽是给我们出难题，也包含着前人经历留下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经验里潜藏着众多精神财富。有出息的后人，一定是在对前辈的经历作过认真清理之后，明辨何谓继承与扬弃，汲取历史智慧，谨记历史教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获取比前人更开阔的视野，创新开来的承诺才有所依凭。“远亲不如近邻”，当代史的魅力就在于离我们很近很近，从切用的程度上说，古代史永远赶不上它对历史前行所具有的直接启发性。所以，我对当代史研究有特别的期盼，在多次场合不吝鼓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庆幸的，历史研究风气的大变革已经看得到希望了。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大约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其主旨是将帝王将相的历史变为人民大众的历史。这一过程走得很艰苦，由于缺乏与“新问题”相呼应的“新史料革命”作坚实的支撑，对人民的历史地位，对民众的生存状态，仅凭传统文献演绎，或“雾里看花”，或“隔靴搔痒”，终究不能完全落到实处。待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眼睛向下，跳出书斋，走到“现场”，史学关注的重心才真正从国家、政权下移到基层、群众。田野村落的考察，民间史料的发掘，口述史的兴起，使“人民的历史”不再苍白空泛，而民间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可以凭借不断丰富新史料得以逐渐被感知与再呈现。传统的“中国通史”因许多重要历史细节的不断揭开，纠正了不少由模糊或粗糙的印象带来的误读，亟须重新改写。

继后的变革，便是史学重心的第二次下移，由明清史、晚清史、中华民国史逐渐下移至当代史。在此前历史内涵拓展的第一次变革基础上，这次再体现为历史时段往下延伸的变革，直逼当下。当代史的兴起，要拜赐于“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的大氛围。借助学术宽松环境的保护，经先行者的艰苦拓荒，当代史研究正在一步一步地由“潜流”变为“明河”。以我的观察来看，觉得现在已经是“流水已到，渠成有待”，不远处将会响起澎湃的潮声。与西方历史学发展的态势相似，在中国，当代史一定会成为史学的热点和“显学”。哪个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领导，敏感而具胆识，勇开风气，有远见地将它确定为史学发展的重心，及时组织队伍，设计与安排好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这个单位必将占得先机，在未来学术排行榜的竞赛中优先摘得桂冠。长江后浪推前浪，潮起潮落，史学人才团队的重新排序才刚刚开始，十年固步自封，二十年后，先进变落后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到那时恐将悔之而莫及。

我以为当代史的研究，应该先集中梳理 1949 年至 1976 年时段。相比于仍在流动中的“改革开放”历史，先前的 27 年已经具备了“沉淀的历史”之资格。1976 年以后也可谓“当代史”，但历史过程尚未走完，许多精彩的大戏还在后头，视为考察对象，作历史学的讨论，难免混同于“当代问题研究”，有“即时”效应，却少“历时”价值；而严格意义的史学研究，总是针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从而才可能避免因较多“主观性”的渗入而妨碍史学的冷峻、真实、客观、全面等特性的坚持。过去常说的“后朝修前朝史”的说法，也多半是在这个意义上提醒修史者在条件不成熟时勿仓促从事。例如明代，从中后期开始就有各种民间所修的本朝史籍，有关晚明的笔记野史更夥不胜计，但基于各人掌握的史实有限，更因为修史者身处“时局”中，非“旁观者”，基于派系利益、思想分歧、亲疏偏见带来的问题甚多，被人讥之为“谀史”、“谤史”、“诬史”者不乏有之，许多判断经不起兹后时间的检验。只有到了清初，一代历史（乃至一代“当事人”）走完，历史完全沉淀了下来，博采前人史料，精心筛选勘比辨伪寻真，《明史》的修纂才比较成功（但与《史记》相比，其史识之高下不可以道里计）。

“秉笔直书”，真实是史学的灵魂。史学离开了真实就不再是“神圣的殿堂”。史学不是要直接告诉人们现在和将来怎么做，而是要讲述人们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的来龙去脉，行为的动机与结果，最终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出色的历史学家往往也是讲故事的能手，但讲故事

并不直接等同于史学研究。任何一个故事都不是孤立发生、孤立存在的。围绕着某个故事，有前因有后缘，更有内外纵横左右关联，它的结果有显潜正负四种效应，有些结果可能不是“立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越是复杂重大的事件，其因果关系越是呈现蛛网状，牵丝攀藤，斩不断，理还乱。当代史研究将不再有古代史学研究常遇的史料贫乏或枯竭之窘，但也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史料横溢”的挑战，困迫于史料检验、考订与适度诠释之繁难，讲究史学方法的改进，强调史料应用的严谨性与周密性，均显得特别紧要。严耕望研究唐宋交通史还有可能以“将史料一网打尽”傲雄一世，今日谁敢发此狂言？但此层意思还不能丢。证据越多越好，多一分证据就多一份底气。最怕的是以发现某“新史料”为满足，就此件说此事，胆大的还横加发挥延伸，由此及彼，难保不出纰漏与笑话。因此，我建议当代史研究兴起之初期，特别需要建立“史料学”课程，以培养后进，就像军训演习队形一样，看无实战效应，却是将来打仗时必须先得具备的“严守纪律”的素质基础。

许多人对韦伯的“价值中立”说不以为然，我个人却觉得这个提示对我们“古为今用”的旧习不无纠偏疗伤之效。我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预测学，也不赞成将当代史挂钩于“当代问题研究”。由历史直接导向决策，从而预测未来将可能发生什么，从来都是以“测不准”告终。历史的智慧表现为历史感。历史感最能克服浅薄的功利观。我希望当代史研究将具有博大的胸怀，深远的历史眼光，将当代历史积淀下来的成果转化为历史的智慧，历史智慧转化为思维方法的改善。我们这个民族，在思维方法上吃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的亏实在够辛酸的了。

最后，我建议当代史研究（也包括整个史学研究）要培育起正常、健康的史学批评风气。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也一定是史学讨论与批评最热烈的时期。在“新史学”提出之初，在清代通史草创之时，在“近代史”编纂滥觞之际，学界相互批评商榷的风气很盛，指摘不乏火药味，但都秉着学术求真的精神，绝不虚伪做作，阿世媚俗。回看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公报》“副刊”的书评，大家频频出手，批评不留情面，针砭既狠又准，这样的学术氛围真让人羡慕。那个时代，张荫麟敢于对陈寅恪的批评“说不”，发文回辩，而陈氏对张内心实爱赏有加。《大公报》连续刊出陈恭禄与萧一山的反复争辩，陈氏言辞不假客气，却促成（也可谓“逼迫”）萧氏出国访学，寻找涉外“新史料”；他的《清代通史》从第二卷起因此别开生面，焕然一新，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告别文革“大批判”的做法，却变态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便是“烂好人”满天下，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是与非。现在虽不时也有“书评”刊出，却是好话说尽，对不足与问题用鸡毛帚子轻轻一掸，这于作者与读者有什么好处呢？趁当代史研究开局的大好形势，我觉得祛除庸俗的相互捧场陋习，树立争辩批评新风，正当其时。

（责任编辑：陈炜祺）

The Expect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Wang Jiafan